

# 进口贸易引致的消费者福利研究进展 与高质量发展的启示

高新,徐静

(安徽财经大学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摘要:**为研究进口贸易与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基于进口贸易、消费者福利等相关文献,对其研究视角、逻辑思路、经验方法以及相应结论等进行系统梳理和归纳。研究认为,目前进口贸易引致消费者福利的研究基本沿着进口产品价格、产品种类以及产品质量的思路不断推进,但是在细化消费者定义、明晰理论机制、完善机制传导链条等方面还需要继续深化研究;基于此,提出进口贸易引致的消费者福利方面是值得进一步拓展研究的方向,中国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也需要有更加多样化的产品进口,在进口贸易理论与传导链条等方面深度挖掘消费者福利增长的机制,推动中国经济实现持续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进口贸易;消费者福利;新时代;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产品种类;基准范式;贸易福利;产品质量;经验分析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20)06-0023-15

## Research progress on consumer welfare caused by import trade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GAO Xin, XU Ji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s,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233030, Anhui,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import trade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and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s, logical ideas, empirical methods and corresponding conclusions based on a large number of literatures related to import trade and consumer welfare.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current

收稿日期:2020-08-11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Y2018D25)

作者简介:高新(1986-),男,江苏扬州人,讲师,经济学博士。

research on consumer welfare caused by import trade has been advancing along the ideas of import product price, product variety and product quality. However, in terms of refining the definition of consumers, clarifying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 and improving the mechanism transmission chain, we need to continue to deepen the research arou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goal.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direction of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consumer welfare caused by import trade in the future. It proposes that China's high-level opening-up in the new era requires more diversified product import, that China further explores the growth mechanism of consumer welfar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mport trade theories and transmission chain, so as to drive the sustaine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Key words:** import trade; consumer welfare; new era; opening-up;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product variety; benchmark paradigm; trade welfare; product quality; experiential analysis

进口贸易作为中国对外贸易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优化国际和国内资源配置、竞争促进效应、缓和贸易关系等,是中国强国之路的主要举措之一,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纽带。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时代,如何维持中高速可持续运行并实现蕴含福利水平提升的高质量发展,将赋予进口贸易更有价值的时代意义。出口贸易是手段,进口贸易也是国民福利的重要体现,进口贸易的高质量发展将是中国高质量发展战略推进中的必要环节,科学合理全面的进口贸易政策制定需要考虑微观基础,因此,审视进口贸易引致的消费者福利的增进更具现实意义。

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传统贸易理论(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以及新新贸易理论阶段,学者们从不同研究视角、研究对象以及解释范围等领域作了有益尝试。其中,贸易福利是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研究历久弥新的核心议题之一,也是贸易实践的根本动力,但是已有相关研究并未给出清楚的答案<sup>[1]</sup>。尽管主流理论主要关注出口贸易和生产者供给维度,并构建了关于贸易动因、贸易模式、贸易福利及其分配等核心问题相对完善的研究体系,但对进口贸易以及消费者需求维度缺乏足够的重视。特别是进入新时代后,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以及扩大开放被赋予了更高价值的现实意义,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连续地成功举办、“一带一路”倡议平稳有效推进,以及一系列开放贸易政策

的出台等无一不体现中国对进口贸易前所未有的关注。同时,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战略更加关注民生福祉的提升,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要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已成为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目标。因此,我们不禁要问,进口贸易可以通过哪些途径影响消费者的福利?对消费者福利有什么样的影响?进口贸易对高质量的扩大开放有何重要意义?

相较于出口贸易相关研究,进口贸易的研究在文献数量以及深度上都有所欠缺。基于已有研究,我们能够知道什么?基于发展需要,我们还想知道什么?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借鉴国际经验,更不能脱离自身特点,因此,本文回顾了“进口贸易引致消费者福利”相关的大量文献,对已有文献的研究视角、逻辑思路、经验方法以及相应结论进行系统梳理和归纳。在此基础上,对新时代中国高质量的扩大开放有益启示和不足之处深度挖掘,进而提出“进口贸易引致的消费者福利”未来值得进一步拓展研究的方向,以期从理论和现实方面对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探讨。

### 一、消费者福利的理论发展

基于完全竞争市场、产品同质性假设框架和静态均衡分析的传统贸易理论认为,比较优势决定了国际专业化分工和生产规模,国际市场供求关系决

定(相对)国际价格,从而影响贸易双方的福利水平,消费者剩余则是衡量消费者福利的主要方法。但是完全竞争市场和产品同质性与现实严重不符,这一现象引起了广泛关注。

20世纪80年代以后,沿袭D-S模型的逻辑<sup>[2]</sup>,新贸易理论基于垄断竞争市场和差异化产品框架,假设企业规模经济和消费者多样性偏好,从产品多样化角度研究了国际贸易福利。Krugman et al.认为即使技术水平和要素禀赋相同,产品多样化、企业的定价能力下降以及规模报酬递增也能增进贸易引致的消费者福利<sup>[3-5]</sup>。特别是“产品多样化”假设的提出,为之后的国际贸易福利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视角。与数量增长引致的贸易福利水平提升不同,产品种类多样化引致的贸易福利不仅能满足消费者多样性偏好,同时还具有较高的抗风险能力,从而有利于一国经济贸易高质量动态发展<sup>[5-6]</sup>。

在传统贸易理论中,无论贸易成本和市场规模如何,市场出清是均衡分析的重要假设,因此,贸易福利来自(相对)价格的变动,而忽视了产品种类的变化。垄断竞争模型指出,即使价格不变化,一国也能因为进口产品种类增长而获利,其机制有两条,一是贸易成本下降使得进口新产品会获利,二是国外市场规模扩大会产生更多产品种类需求<sup>[7]</sup>。对于消费者而言,国际贸易使得消费者可以通过进口产品的种类变化影响其效用水平和贸易福利,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代表性消费者具有多样化消费的偏好,因此进口贸易带来的产品种类增加有助于提升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水平,从而提升国际贸易福利。但是将所有产品种类纳入到原本就难以直接估算的消费者效用函数中,测算开放贸易后的贸易福利具有很大难度。二是进口产品种类增加,在逻辑上相对于产品价格会下降到有限价格,使得消费者面临的价格指数(生活成本)下降、实际收入增加,从而提升消费者的效用水平<sup>[3-5]</sup>。Krugman认为均衡时零利润条件和成本加成下降使企业规模经济发挥作用,因此,价格成本加成下降引致的消费者福利提升并不会损害企业利得<sup>[3]</sup>,但相应的经验研究进展较为缓慢<sup>[8]</sup>。同时,产品质量

已成为影响消费者消费和福利水平的重要因素<sup>[9]</sup>。Feenstra指出在垄断竞争框架下的国际贸易福利受进口产品种类增加、社会资源配置优化(影响产品数量和质量)、进口竞争引起的企业定价能力下降(影响产品价格)等因素影响<sup>[10]</sup>。也就是说,对进口贸易而言,可以通过产品价格、产品数量、产品种类以及质量等渠道影响消费者福利。

从已有相关的贸易理论发展来看,关于进口贸易引致消费者福利的理论正在不断完善。进口贸易可以通过3个渠道影响消费者福利,分别是进口产品的价格维度、种类维度以及质量维度,已有相关研究也暗含了进口产品的数量维度。基于此,相关经验研究从进口竞争引致的价格成本加成下降和关税传导等方面的产品价格、进口产品种类增长,及其与本土产品种类替代性等方面的产品种类、产品质量等维度进行了广泛探讨。

## 二、基于进口产品价格的消费者福利研究

产品价格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是学者们较早关注的方向,已有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视角,一是开放状态通过价格变化影响消费者福利,二是国际市场(价格、环境)对进口国产品价格产生影响,进而动态影响消费者福利。

### (一) 开放状态与进口产品价格

进口产品的价格变动对一国进口贸易福利影响意义重大。传统贸易理论强调基于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分工、根据国际供求关系决定的国际均衡价格进行交换,进而提升各国的贸易福利。通过将产业经济学中的“保留价格”概念引入国际贸易理论分析中,Hicks指出可以利用产品“保留价格”和消费者剩余测度消费者福利水平<sup>[11]</sup>。具体而言,一方面产品的“保留价格”会随着消费者需求曲线变化,另一方面进入市场后产品供求关系决定了交易价格,因此消费者的“保留价格”与最后实际交易价格之间的差额就是购买该单位产品的贸易福利,即

消费者剩余。基于此, Hausman 利用微观数据测算出手机和早餐全麦粥的产品“保留价格”,进而估算单一产品数量增长引致产品价格下降给美国消费者带来的贸易福利<sup>[12-14]</sup>。这种方法为进口贸易引致的消费者福利提供了一个简单思路,但是贸易自由化以及产品多样性让预估每个产品的“保留价格”不太现实,不同市场的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保留价格”并不一致,因此,该方法只适用于特定市场的单一产品。

经济状态由封闭转向开放所带来的福利变化是国际贸易福利研究中的标准范式,这也成为不少文献研究的切入点。传统贸易理论认为,经济状态会通过国际供需关系决定国际交换价格,从而决定贸易福利水平。基于此, Bernhofen et al. 认为,当一个经济体从封闭转向开放时,其贸易福利的变化取决于静态比较优势而不是经济结构以及技术创新等因素的变动,并借助斯拉茨基补偿概念,利用 1851 ~ 1853 年日本的 GDP、产品价格以及假想的进口产品数量 3 类数据进行自然实验分析,结论表明,从封闭走向贸易开放使得产品价格发生大幅度下降,进一步使得消费者实际收入提升,即贸易模式转变后日本从静态比较优势中获得福利增长<sup>[15]</sup>。Huber et al. 较早发现,开放的自由贸易使得日本的实际收入提升 65% 左右<sup>[16]</sup>。基于对 Bernhofen et al. 框架的简化分析,梁碧波利用 1978 ~ 1985 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数据测算有限自由贸易和完全自由贸易下中国从比较静态优势中获取的贸易福利,结果表明两者分别不超过 GDP 的 1.35% 和 5.00%<sup>[17]</sup>。需要注意的是,这类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基于完全竞争模型的新古典贸易理论框架,只属于静态分析范畴,并未考虑结构性变化和技术进步等因素的作用。同时,对产品价格数据和贸易数据的要求较高,应用范围具有较大局限性,通常只适用于封闭转向开放的特定历史阶段。

## (二) 国际环境与产品价格

有些文献基于外部环境从进口竞争引致的价格成本加成下降、关税传导等角度对进口产品价格

变化引致的消费者福利进行了研究。考虑到动态情况,学者们开始关注进口产品国际价格对国内价格的影响,进而反映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研究结果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进口产品的国际价格显著正向影响国内消费价格,还有一类是不存在显著关系。罗知等、王孝松等分别考察了进口产品和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对中国消费者消费支出的影响,从而对消费者福利产生影响,但存在一定的滞后性<sup>[18-19]</sup>。魏浩等分析了(资源品、中间品以及消费品)不同类型产品进口价格对国内产品价格的影响,发现资源品和消费品进口价格对国内消费价格有推动作用,但中间品的影响方向不明确且不稳定,从而对消费者(企业)福利影响不确定<sup>[20]</sup>。

贸易开放使得进口国本土市场竞争加剧,迫使本土企业降价从而提升消费者福利,但与此同时贸易开放也会使得国际外部需求增加,进而缓解本土企业在国内的竞争压力<sup>[21-23]</sup>。也就是说贸易开放的关税传导机制并未完全发挥作用<sup>[24-26]</sup>,而国际外部需求越高,关税传导机制越不完全<sup>[27]</sup>,进口贸易通过产品价格下降引致的消费者福利越不明显。Nicita 指出,进口产品价格下降、数量和种类增加会同时加剧进口国市场的竞争,从而通过国内产品价格下降让利于消费者<sup>[28]</sup>,而且 Han et al. 利用中国城市家庭调查数据研究发现,这种现象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sup>[29]</sup>。但是由于缺乏产品 - 关税 - 国内价格维度的数据,相关经验研究较为缺乏<sup>[30-31]</sup>。基于此,孙浦阳等在匹配进口关税、海关数据以及国内消费价格的基础上,对 2000 ~ 2010 年中国 126 个城市 70 种消费品研究发现,由于国际外部需求的影响,国内产品价格下降并不完全,从而削弱了消费者福利提升的幅度<sup>[32]</sup>。

不难发现,已有研究虽从不同视角研究了进口产品价格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但大多是立足于进口国国内的整体市场,忽视了该市场的需求消费差异化反映,比如事实上不同地区的社会因素和地理特征不完全一样。在理论上,其他方向的研究已经开始关注国内市场差异性特点,第一类文献是基于进口国市场化水平差异视角的研究<sup>[33-34,29]</sup>,第二类

文献是基于进口国生产供应成本差异的研究<sup>[35-36]</sup>,第三类则是基于进口国消费者偏好差异视角的研究<sup>[37-38]</sup>。这些研究均认为进口国国内市场的特点会引起关税的传导机制差异,造成不同程度的进口竞争效应,从而引起产品的消费价格差异<sup>[39,35]</sup>,特别是国内消费市场规模巨大的中国,市场差异性的作用不容忽视<sup>[40-41]</sup>。这也为将进口国国内市场差异因素纳入到进口贸易通过产品价格引致的消费者福利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 三、纳入产品种类增长的消费者福利研究:国外研究

在评价国际贸易带来的福利效应时,以往研究更多关注出口贸易对企业利得的推动作用。进口贸易不仅能通过进口产品的数量弥补国内产品供给不足,提升消费者福利,还能通过进口产品价格、产品种类以及产品质量等多个维度提升消费者福利。在传统贸易理论中,无论贸易成本和市场规模如何,市场出清是均衡分析的重要假设,因此一般认为贸易福利来自(相对)价格的变动,而忽视了产品种类的变化。垄断竞争模型指出,即使价格不变化,一国也能因为进口更多的产品种类并通过两者途径增进消费者福利,一是外国市场需求规模扩大导致产品种类增加,二是贸易成本下降<sup>[7]</sup>。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以及技术水平不断提升,世界各国愈发多样化的生产为消费者多样化选择提供了可能,进而满足消费者多样性偏好并提升其福利水平。因此,进口贸易中产品种类增长已成为增进消费者福利的一个重要渠道。

Dixit et al. 首次在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纳入产品种类并构建 D-S 效用函数,塑造了垄断竞争模型雏形<sup>[2]</sup>。此后,Krugman 基于消费者偏好多样性、规模经济以及差异化产品假设,将生产多样化(外国市场规模扩大,生产更多种类产品)与消费多样化(进口国消费者可以购买更多种类的产品)有效结合,进而奠定了进口产品种类增加是(消费者)贸易福利主要来源的理论基础<sup>[3-5]</sup>。由于消费者效用和

贸易福利难以量化,传统贸易理论无法做到全面测度,虽然新贸易理论的垄断竞争模型为进口贸易福利测算提供了理论框架,只需在技术层面上将“新增产品”纳入价格指数就可以测算进口贸易中种类增长引致的贸易福利,但受限于细分数据难以获得以及模型可操作性不强,进口贸易中产品种类增加引致的消费者福利经验研究发展缓慢<sup>[42-43]</sup>。Romer 指出,贸易壁垒和市场进入的固定成本存在,限制了进口国产品种类的选择性,贸易自由化会带来相当于 20% 的 GDP<sup>[44]</sup>。Feenstra 则认为,即使不完全自由化,新增加的进口产品种类也能显著增加消费者福利<sup>[45]</sup>。但是上述两篇文章只是假设性的潜在福利水平估计,忽视了产品种类数量变化引起的价格变动<sup>[7]</sup>。直到 Feenstra 通过构造进口产品价格指数来评估美国进口贸易中产品种类增长带来的消费者福利水平变化后才有所改观<sup>[46]</sup>。

#### (一) 产品种类增长的价格指数构造基准范式

通过估算特定产品的供给和需求函数,Petrin 最早系统性研究了产品种类变动对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影响,但由于涉及的数据量巨大、估算程序复杂,所以无法推广到所有产品<sup>[47]</sup>。基于数值模拟方法,Romer 量化分析了所有产品种类变化引致的福利水平变动,但缺少理论机制梳理让基于实证结果制定的相关政策大打折扣<sup>[44]</sup>。同时,以上研究关于“产品种类间固定的替代弹性”假定无法得到现实支持。

基于此,在新贸易理论的垄断竞争框架下,Feenstra 结合固定替代弹性(CES)效用函数和对数变化指数构建了能够从差异化产品需求层面解释进口产品种类新增和消失的单一产品价格指数,并利用支出份额、基于 CES 消费函数比率和国家面板数据估算所得的进口产品种类替代弹性,进而估算了美国进口贸易中产品种类引致的消费者福利水平。其结论表明,美国因进口贸易中产品种类增长引起生活成本(价格指数)下降,进而增进消费者福利水平<sup>[46]</sup>。Feenstra 的单一产品价格指数解决了微

观数据获取以及产品种类间的替代弹性估计等问题,为进口贸易福利测度奠定了基础,但替代弹性之间存在多重性问题<sup>[7]</sup>。同时,只涉及8个产业的价格指数无法全面解释消费者效用、固定进口产品种类,容易导致估算偏误,因此该方法存在明显不足之处。

基于此,Broda et al. 将 Feenstra 的固定替代弹性(CES)拓展为嵌套固定替代弹性(Nested CES, NCES)模型,构建能够反映进口产品种类变化的复合价格指数,进而利用美国1972~1988年和1990~2001年两个时间段进口贸易及产品种类增加的数据,全面测算了进口贸易中产品种类增长引致的消费者福利。结果表明,1972~2001年间美国平均进口产品价格指数是传统价格指数的98.8%,消费者因为进口产品种类增加引致的实际收入上升为2.82%,带来的消费者福利占2001年美国GDP的2.60%<sup>[7]</sup>。这一数值是消除贸易保护带来贸易福利的3~6倍<sup>[44-45]</sup>。因此,进口产品种类增长引致的消费者福利实质上就转变成“消费者为了获得更多种类进口产品的消费愿意支付多少GDP” Broda et al. 以及 Feenstra 利用 CES 效用函数构造的可直接测算的价格指数,为进口产品种类增加引致的消费者福利测度提供了标准方法<sup>[7,46]</sup>。借助上述方法,进口贸易产品种类增加引致的消费者福利相关研究开始涌现,并已取得大量成果。

## (二) 基准范式的运用

一些学者以单个国家或地区为研究对象测度了进口贸易中产品种类增长引致的消费者福利。Mohler 利用 Feenstra 的精确价格指数对1990~2006年间瑞士因进口种类增加引致的消费者福利进行了测算并与美国进行对比。结果发现,瑞士消费者福利占其GDP的0.27%,而美国是瑞士约两倍,达到0.52%。将贸易福利按产业分解,发现两国产业差异均很明显,将贸易福利按地区分解发现瑞士贸易福利主要来源于德国和意大利等邻国,而美国来源分布较均匀<sup>[48]</sup>。以1995~2007年葡萄牙进口贸易为研究对象,Cabral et al. 利用 Broda et al. 的方法

研究发现,进口种类净增长使得进口产品价格指数累计降低2.3%,引致消费者福利增长占GDP的0.7%,是欧盟因此获利最多的国家。同时,在不同行业和生产阶段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基本金属制造”和“纺织品制造”两个行业贡献度最高,分别达到45.0%和13.3%,加工产品进口和资本品进口则分别是生产阶段贡献度高低两极<sup>[49]</sup>。Giuseppe 利用1978~2002年英国SITC、HS以及CN等进口细分数据,对不同分类方式进行了比较研究,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视角<sup>[50]</sup>。基于西班牙1988~2006年进口贸易数据测算,Minondo et al. 研究发现,进口产品种类增加引致的贸易福利占其GDP的1.2%,并按进口的来源将贸易福利分解发现,中国的贡献度最高,占其福利增长的11.8%,相当于欧盟15国的贡献度(13.6%),此外,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匈牙利、捷克、埃及以及波兰等6国贡献度均超过3.0%<sup>[51]</sup>。Chen et al. 利用加拿大1988~2007年的数据,测算了进口种类增长及其引致的贸易福利,发现进口种类增长76.0%,福利水平增长28.2%,其中移民流入具有较强促进作用<sup>[52]</sup>。

对于多个国家或区域组织而言,Gaulier et al. 利用新兴市场经济体(印度、印度尼西亚以及巴西等)和欧盟发达国家1994~2003年HS6位进口贸易数据,测算了进口产品种类增长引致的贸易福利,发现忽视进口种类增长的作用使得传统价格指数被高估,同时发现由于经济快速增长引起实际汇率贬值,导致新兴市场经济体比欧盟发达国家具有更大的高估偏误<sup>[53]</sup>。Mohler et al. 利用1999~2008年欧盟27国CN-8层面的进口数据研究发现,小型国家和新加入欧盟国家会从进口产品种类增加中获得更高贸易福利,而且欧盟内部贸易是进口产品种类增长引致福利效应的主要来源。该文得出拉脱维亚从欧盟国家和非欧盟国家进口产品种类增长引致的总消费者福利占其1999年GDP的3.0%<sup>[54]</sup>。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进一步发展,进口种类增长会使全世界受益。Feenstra et al. 基于 Broda et al. 的替代弹性值和 Penn World Table (以下简称 PWT) 数据对世界146个经济体研究发

现,以1996年为基准年,进口贸易中产品种类增加引致世界福利水平的提升占世界GDP的比重高达13.0%,而且发展中国家相较于发达国家比重更高<sup>[55]</sup>。同时,福利水平占GDP的比重会随着替代弹性取值变化在9.4%~15.4%之间波动。当所有国家都取消贸易壁垒时,进口产品种类及其引致的贸易福利会进一步增长<sup>[56]</sup>。

### (三) 基于基准范式的拓展研究

虽然Feenstra与Broda et al.的价格指数方法在进口贸易引致消费者福利的研究中得到广泛作用,但在进口数量的作用、产品种类数据的细分、国内产品种类的替代性以及消费者需求可变性等问题上得到了学者们的进一步讨论。

如前文第二部分消费者福利的理论发展中所述,相关理论研究其实暗含了进口产品的数量维度。但是上述研究并未引起足够关注。基于进口产品种类增长和进口数量共同作用的考虑,Arkolakis et al.利用Feenstra的精确价格测算了哥斯达黎加由于进口种类增长带来的消费者福利,得出一个有趣的“弯曲效应”结论,即由于产品间的差异性较小,虽然贸易自由化导致进口种类快速增长,但是新增进口产品数量很小,导致消费者福利水平提升不明显<sup>[57]</sup>。Mohler在关于进口产品种类增长是引致消费者福利之一核心视角下,进一步研究发现,2002~2012年间进口数量的增加对欧盟国家进口贸易福利也有显著推动作用<sup>[48]</sup>。

无论是单个国家或地区,还是区域组织或全世界,国际贸易扩大了各国市场容量,产品种类增长会增加进口国消费者福利已得到广泛共识。上述研究实质上有一个隐含假设,即消费者受益于贸易开放从进口产品多样性中获利,不会因为进口国本土产品多样性减少(或假设本土产品多样性不变)而受损。但是由于未考虑进口产品种类与进口国本土产品种类之间的替代关系,消费者福利水平测度的准确性可能有误。Ardelean et al.利用美国1991~2001年进口贸易数据测算了美国国内产品种类变化引起的贸易福利平均偏差达到8%,而且

在行业间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机械和运输工具行业被高估41%,电子行业贸易福利则被低估93%<sup>[43]</sup>。该文在考虑国家间产品种类替代性后,估算出来的消费者多样性偏好比Krugman的结论低44%,同时,进口国原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会导致抑制进口竞争作用减少进口,从而造成消费者福利损失。Kancs发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对进口种类引致国际贸易福利存在两个不同方向,即进口种类增长会提升消费者福利水平,但进口国因为开放贸易导致国内本土产品种类萎缩,从而导致消费者福利下降。以东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例,前者的消费者福利效应大于后者,表明开放贸易整体上能促进消费者福利提升<sup>[58]</sup>。

同时,有学者对上述研究中产品种类的界定和划分的细致性提出质疑,认为贸易福利的测算仍停留在产品加总层面,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种类增长数量,会低估进口产品种类变化程度、高估一国对进口产品的需求弹性。Blonigen et al.认为即使在HS-10位的数据也存在原本不同种类的商品被混为一谈的可能。因此,该文从品牌、尺寸以及功能等角度,以及市场交易数据对美国汽车市场的产品进行细分,从而测算了美国1990~2006年间汽车进口产品种类增长。研究发现细分市场数据比利用美国进口贸易数据测算的贸易福利大一倍,如果再考虑到外商设厂生产更多汽车种类,福利水平还会提升70%<sup>[59]</sup>。虽然利用更细化的市场交易数据可以获得更准确的结果,但该类研究在数据可获得性以及测算方法的推广方面存在致命缺陷,相对而言只能限于某一产业或特定产品市场的贸易福利测算。

此外,由于Broda et al.以及Feenstra一方面为了便于通过CES函数理论推导出价格指数,均假定消费者需求不变,也就是消费者对进口产品不同维度的偏好不会随着时间而变化,与现实不符<sup>[7,10]</sup>。另一方面在需求方程估算过程中又提出与理论相悖的需求可变假定。基于不变需求假设,Benkovskis et al.估算发现,消费者偏好以及产品质量变化对欧洲7国进口种类增长引致的消费者福利水平有重要影响。但是该文一方面未彻底解决不变需求的问题

题,另一方面忽视了基准种类质量对相对质量参数估计产生的影响<sup>[9]</sup>。Redding et al. 基于放松了的需求参数不变这一假设构造了统一价格指数,该指数与传统价格指数可以相互转换,进而充分考虑进口产品需求以及产品种类变化引致的消费者福利<sup>[60]</sup>。同时,假设进口需求弹性不变,导致固定的价格成本加成,忽视了国际贸易对国内企业市场规模和定价能力促进竞争效应。一些学者通过构造偏好系统来实现可变价格加成,主要包括 Melitz et al. 的二次偏好系统以及 Feenstra et al. 的超越对数偏好系统<sup>[55,61]</sup>。前者能够说明产品种类增加会对国内同类产品生产者产生竞争效应,从而引起其价格调整。后者更直观表明可变的产品种类间替代弹性,可以从贸易福利中剥离出价格加成引致的福利,并且能够说明贸易自由化导致的贸易创造效应大于转移效应。Feenstra et al. 对美国因全球化背景下进口产品种类和价格加成引致的贸易福利比较发现,两者福利水平大小相似,但作用机制完全相反,种类增长引起福利上升,而价格加成下降引起福利上升<sup>[55]</sup>。同时,小国因为价格加成下降引致的福利增长较大国更明显<sup>[62]</sup>。

到目前为止,进口贸易引致的消费者福利虽已得到广泛关注,但是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深度挖掘和进一步完善。

#### 四、纳入产品种类增长的消费者福利研究:中国故事

不难发现,上述研究均基于其他国家的典型事实,中国关于进口贸易中产品种类增长引致的消费者福利相关研究起步较晚。不容忽视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推进,包括进口产品种类在内的中国进口产品相关指标规模数量快速增长<sup>[63]</sup>。

利用 CEPII-BACI 数据库 1995~2004 年中国与 40 个贸易伙伴 HS-6 位数进口和出口贸易双边数据,钱学锋等发现忽视产品种类变化的进口价格指数向上偏误 0.73%,出口价格指数向下偏误 0.93%,

造成贸易条件恶化 1.36%,间接说明了贸易福利的变化<sup>[64]</sup>。陈勇兵等发现 2004 年中国进口产品种类的数量比 1995 年增长 34.26%,达到 93 587 种<sup>[65]</sup>。该文在 Broda et al. 复合价格指数的基础上,利用 1995~2004 年中国 HS-6 位进口数据估算了中国进口产品种类增加引致的消费者福利。结果表明,传统价格指数被累积高估 4.36%,10 年内中国消费者由于贸易开放引起进口产品种类增加所带来的福利水平已占到中国 2004 年 GDP 的 0.84%,而进口价格指数偏误主要来源于福利贡献较高的产业(无线电、电视和通讯设备和装置的制造贡献 77.40%)和生产阶段(配件和零部件贡献 82.78%)。基于 1997~2008 年中国 HS-8 位进口贸易产品数据,Chen et al. 利用复合价格指数对中国进口产品种类增长引致的贸易福利测算发现,这部分福利平均每年占中国 GDP 的 0.4%,总计约 4.9%。按照进口来源地分解发现,日本、加拿大、德国以及一些自然资源充裕的国家是这部分福利的主要贡献者。虽然该文基于简单的种类数目计算了进口产品种类之间的替代弹性,但是并不能真实反映中国进口产品种类的变化及其引致的贸易福利<sup>[66]</sup>。陈松等利用 2002~2010 年 UN comtrade 数据库中国 HS-6 位进口贸易数据考察了中国加入 WTO 对进口产品种类增长引致的福利影响,发现入世后传统价格指数累计被高估 1.896%,引致贸易福利损失占 2010 年中国 GDP 的 0.419%,贡献较大的进口来源地为欧盟、美国和日本,贡献较大的行业集中在制造业(化学品及制品制造、能源矿产资源产品制造)<sup>[67]</sup>。

基于进口产品数量和产品种类共同作用,谷克鉴等利用 2002~2012 年 HS-6 位(剔除能源类产品)的中国进口数据研究发现,中国进口产品数目变化较小,产品内进口来源国的集中度下降。具体而言,在估计了 3 982 个产品种类间的替代弹性后发现,产品数目变化使得进口产品价格指数及其引致福利占 2012 年 GDP 数值分别为 0.60% 和 0.13%,如果将替代弹性假设为 2,价格指数偏误及福利则分别变为 10.33% 和 2.28%,而产品种类增长造成的价格指数偏误和福利占比分别为 10.90%

和 2.41%。进一步研究发现,进口来源地贡献度较高的国家是澳大利亚、巴西以及美国,产品类别贡献度最高是初级产品,产业贡献度最高是金属矿采车、化学品制造。同时该文指出中国进口市场中消费品领域引致的福利只占 15%~20%,有待进一步挖掘<sup>[68]</sup>。基于贸易二元边际视角,逯建等利用 1995~2009 年 17 个国家的 CEPII-BACI 数据库 HS-6 位进口贸易数据研究发现,集约边际对进口贸易福利影响不显著,但是广延边际能够通过进口产品种类数量以及进口产品规模数量增进消费者福利,其中国家进口总量以及个人消费水平分别正向和负向影响消费者福利<sup>[69]</sup>。除了进口贸易规模、进口产品技术含量和种类变化会影响消费者福利,魏浩等认为进口地区结构多元化、实际汇率变动也能一同影响消费者福利。该文利用中国海关以及 CEPII-BACI 等数据库的 HS-6 位和 HS-8 位货物贸易微观进口数据研究发现,所有类型的产品进口均有利于增加消费者福利。HS-6 位和 HS-8 位数据下,进口产品种类增长引致的消费者福利增加分别占 1998 年 GDP 的 0.40%、2000 年 GDP 的 0.42%,相当于 338 亿~417 亿元。但是考虑到人民币汇率以及实际有效汇率变化,消费者福利增长幅度则有所下降<sup>[70]</sup>。

考虑到进口贸易数据细分程度对贸易福利估算的客观性影响,王明荣等利用 2000~2011 年中国与 240 个国家或地区 HS-8 位进口贸易的双边数据估算了 4 236 个进口产品间替代弹性、种类增长变化程度及其进口引致的贸易福利。结果显示,替代弹性均值为 43.1,中位数为 7.6。与 2000 年相比,2011 年新增产品、消失产品以及净增加产品种类分别占 4.3%、1.4% 和 1.5%,进口价格指数下降 1.5%,并引致福利增加占 2011 年 GDP 的 0.56%<sup>[71]</sup>。

考虑到消费者需求的作用,在对 Redding et al. 统一价格指数方法扩展的基础上,徐小聪等在可变需求框架下构造进口种类引致的消费者福利理论,并利用 1995~2010 年 CEPII-BACI 数据库将中国与 9 个贸易伙伴的进口贸易进行测算。结论表明,在

需求不变假设下,相对于各国 0.07%~3.36% 的 GDP,进口产品种类增长引致的福利为正,但是考虑到可变需求,进口产品种类增加 0.94%,引致的福利效应可能为负,占 GDP 比重在 -4.02% 到 6.21% 之间不等<sup>[72]</sup>。

需要注意的是,关于中国进口贸易中产品种类引致消费者福利的研究,由于研究视角、数据细分程度以及分析方法不同,得出的结果差异较明显,因此准确性和精确性的相关问题需要审视对待。同时,由于相关研究起步较晚,造成成果数量相对较少,要想对中国进口贸易引致的消费者福利以及其对扩大进口战略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指导意义有客观、清晰以及系统的认识,需要更加全面、丰富以及更具现实意义的研究。

## 五、纳入进口产品质量的消费者福利研究

虽然 Broda et al. 将 Feenstra 的单一产品精确价格指数扩展到多产品复合价格指数,但是仍存在以下不足之处。一是关注的产品为进口最终产品,不符合中间品在进口产品中占较大比重的现实。关于中间品进口对国际贸易福利的影响大多是从企业利得角度展开,比如 Goldberg et al. 利用印度中间品进口数据研究发现,关税下降引致的中间品进口产品种类增加使得投入品的进口价格指数下降,进而企业在技术创新等方面获得贸易利得<sup>[73]</sup>。虽然企业可以被视为中间品的消费者,但是与本文关注的消费者有所差异,故本文不再详细介绍。二是假设进口需求弹性不变,导致固定的价格成本加成,忽视了国际贸易对国内企业的市场规模和定价能力的促进竞争效应(见前文相关介绍)。三是进口产品种类的复合价格指数没有考虑到进口产品质量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

进口国市场进口产品与本土产品在价格、种类以及质量上的差异增加了消费性选择范围,从而提升消费者福利。因此,产品质量因素也成为目前消费者福利研究中的重要维度。消费者在购买高质

量产品时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从而减少产品种类。但如果进口产品存在质量升级的可能或者处在质量阶梯幅度较长的部门,消费者更愿意倾向于消费更多的差异化产品<sup>[74]</sup>,也就是说为保持相同效应水平,消费者会因为进口产品质量调整补偿性变化,从而影响消费者福利。由于开放贸易通常会使得一个经济体进口更高质量的产品,如果忽视质量因素引起传统价格指数被高估,进而导致低估进口贸易引致的消费者福利<sup>[9]</sup>。

由于质量不可观测性和数据不可获得性,质量合理度量是国际贸易经验研究的一个难题<sup>[75]</sup>。“纯价格”表示产品质量的做法一度被推崇<sup>[76]</sup>,但由于无法计算关税、消费税、成本与价格加成以及汇率对质量的影响,传统的单位价值并不能完美度量产品质量。Sheu 指出差异化产品主要体现在产品价格、种类以及质量方面,产品种类实质上就是给定产品价格和质量后的产品数量<sup>[77]</sup>。该文在 CES 和随机系数 logit 需求函数设定框架下,用打印速度和产品功能参数表示产品质量,利用 1996 ~ 2006 年间印度详尽的打印机行业微观交易数据对 2 006 种产品的贸易福利进行测算,结果表明要达到 2006 年的福利水平,两者需求函数设定下的价格需下降 96% 和 76%。

因此,本文认为进口产品质量是国际贸易福利的重要来源,质量提升使得价格指数下降,其中小企业产品质量提升引致的贸易福利更明显。产品功能参数表示产品质量这种做法虽然突破了单位价格的局限,但是详尽的微观交易数据以及产品特征并不能完全反映消费者偏好,所以只适用于特定行业和产品的消费者福利分析。

Feenstra et al. 将产品质量纳入 CES 消费支出函数且假定产品支出与质量反向相关,同时将产品质量纳入 Melitz 异质性企业生产模型,且假定质量与生产率正向相关,从而构建了产品质量的内生决定模型<sup>[78-79]</sup>。Benkovkis et al. 在 Hummels et al. 以及 Broda et al. 的框架下,假定跨期产品质量可变,利用 1995 ~ 2012 年德国、法国、意大利以及英国 Eurostat's COMEXT 数据库 CN-8 位进口数据,估算

了产品种类增加和质量变化引致的贸易福利<sup>[7,9,80]</sup>。

陈勇兵等借鉴 Benkovki et al. 的质量参数估计方法,通过 CES 框架下获得相对质量的表达形式,从而改进了 Broda et al. 的复合价格指数,并基于此,利用中国 1995 ~ 2011 年 HS-6 位的中国进口数据,重新估算了纳入进口产品质量变化因素后进口贸易对中国消费者福利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忽视质量变化导致精确价格指数被高估 19.90%,进口产品质量提升给中国消费者带来的福利占 2011 年中国 GDP 的 3.68%。同时,贸易福利在产业部门以及生产阶段有显著差异,其中进口价格指数被高估,主要来源于“化学品及化学制品”产业和“半制成品”生产阶段<sup>[81]</sup>。但是,通过 CES 效用函数直接纳入质量参数,从而获得相对质量的表达式,无法识别产品质量和潜在产品种类的变化<sup>[46]</sup>,同时质量函数的设定方式会影响结论的稳健性。

基于此,张永亮等通过在 3 层嵌套 logit 离散选择模型和随机效用理论中纳入由市场份额反推得出的质量,推导出包含产品价格—种类—质量 3 个维度、与传统价格指数结构相似且性质良好的价格指数,并利用 1995 ~ 2014 年中国 HS-6 位 27 个行业的进口贸易数据估算进口贸易福利水平。研究发现,20 年间进口产品种类增加,使得价格指数累计下降约 6.0%,平均每年下降 0.2%,质量升级引致的消费者福利与种类增长引致的福利大体相同,占中国 GDP 的 1.24%<sup>[82]</sup>。

笔者认为,产品质量可通过包括需求和供给的多个途径对贸易福利产生影响,差异化产品特性与微观消费者特性交互影响,虽然张永亮等从需求面建立的离散选择模型可以避免非线性工具问题,但是“产品质量特征不随消费者特征变化”过于绝对、给需求面设定了较严格的假设。因为企业生产率水平决定产品的质量,但如果不以满足消费市场需求为导向,企业将无法存活。如何在现有研究基础上纳入需求面的影响因素,构建更具一般性的消费者福利研究体系,是一种有益尝试,也是进口贸易福利引致消费者福利深入研

究的新维度。

## 六、研究启示与展望

### (一) 研究启示

已有文献从进口产品价格、进口数量以及产品种类等角度对消费者福利进行了考察,基于垄断竞争模型的产品多样性假设及其结论奠定了理论基础,基于各种角度构造的进口产品价格指数则是目前衡量进口贸易引致消费者福利测度的核心方法,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经验分享,学者们已经开展大量严谨细致且不断合理推进的工作,并达成了不同程度的共识。但是,仍有一些不足之处值得后续研究进行完善。

第一,产品多样性不能完全等同于产品种类增长。目前,关于产品多样性尚未形成统一定义,产品多样性源于市场竞争<sup>[83]</sup>,通过微观企业(新增产品和产品升级)产品品牌数量呈现<sup>[84]</sup>,进而可以在微观、中观以及宏观层面表示产品多样化。同时,产品多样化还可以分为水平和垂直多样化,前者包括产品种类增加和产品比重的合理分布<sup>[85]</sup>,后者指的是产品在不同技术水平上和质量上的结构性转变<sup>[86]</sup>。因此,就进口贸易产品多样化而言,不仅是进口产品种类的增加,还应该包括不同产品在进口贸易中的合理分布。但是现有进口贸易产品多样性引致的消费者福利仅关注产品种类的增长,忽视了不同产品合理分布的贡献。

第二,贸易引致的消费者福利理论机制需进一步明晰。传统贸易理论通过比较优势、专业化分工以及产业间贸易解释了国家层面的总体贸易福利。新贸易理论通过垄断竞争市场、规模经济以及产品多样性解释了产业内贸易带来的贸易福利,并可分解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福利,前者通过规模经济和生产率提升实现,后者通过消费者以更低廉的价格提高效用以及以更多种类的差异化产品满足多样性偏好实现,这为进口贸易引致的消费者福利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主流贸易理论通过放松技术水平、

市场结构、企业同质性等假设,解释了产业间和产业内贸易等越来越多的贸易问题。但是不难发现,相关研究重点关注供给侧和生产者的问题,对于消费者和需求侧仍有较强的假设约束,从而导致对目前进口贸易引致的消费者福利研究尚未达到对出口贸易和企业利得进行深入研究的高度。因此,借助侧重描述生产者故事的理论框架解释消费者的故事,可能会存在一些未知区域。实质上,国际贸易对企业和微观消费者的影响机制并不完全相同,因此,进口贸易引致的消费者福利值得进一步探讨。

第三,消费者的定义需要进行细化。已有研究关注的福利主体从国家层面、行业层面到企业和消费者层面不断细化,但是与作为中间品“买方”的企业不同,已有研究中消费者的定义仍比较模糊,很多研究没有区分产品类型,将所有“买方”混为一谈,统一定义为消费者。同时,已有研究大多仍基于“代表性消费者”假设,忽视了微观个体(消费者)的异质性,比如微观个体偏好的差异性,诸如性别、家庭等固有特征的差异性、消费选择行为的差异性以及对行为结果感受的差异性等。目前,关于进口贸易引致的消费者福利围绕产品价格、产品种类、产品数量以及产品质量等维度展开研究,部分文献从进口来源地和行业分布等角度对福利进行分解研究,但是消费者异质性对进口贸易引致的消费者福利的影响尚未得到足够重视。

第四,进口贸易引致的消费者福利机制传导链条需完善。一直以来,国际贸易动因、贸易模式、贸易福利及其分配一直是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就进口贸易而言,其传统机制链条应是诸如“影响因素—进口贸易模式—影响渠道—消费者福利—进口贸易影响因素……”一样的完整但不闭合的动态逻辑链。现有文献大多关注假设自由贸易情形下,进口贸易通过产品价格、数量、种类以及质量影响消费者福利,忽视了对进口贸易影响因素(贸易自由化、贸易便利化以及进口国市场特征等)变动对进口行为(决定了产品价格、数量、种类以及质量)进而对消费者福利的动态影响,这一点与全球化背景下瞬息万变的现实不符。

## (二) 研究展望

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进口贸易无论从不同角度的贸易结构优化方面,还是最终的消费者福利水平增进方面都应更有效率。同时,高质量发展还应蕴含可持续性,完整但不闭合的动态机制传导链条则为其提供了不断纠错和调整的可能。

已有研究表明,进口产品数量规模扩大、产品价格下降、产品种类增长以及产品质量提升对消费者福利水平的增进有积极作用,为以进口贸易促进民生福祉的方式提供了重要依据。但是,进口贸易本身会受到各种因素(贸易自由化、贸易便利化以及进口国市场特征等)的影响,对于影响因素的合理调控,挖掘进口贸易的潜力,进而通过价格—数量—种类—规模增加消费者福利是一个潜在方向。

同时,消费者之间对福利的感知或体验也不完全相同,对于消费者异质性这个黑匣子及其对福利传导效率的影响又是一个潜在方向。随着大数据技术和经验分析工具不断发展,上述潜在方向的研究也可能变为现实。总而言之,进口贸易如何通过高质量的发展促进消费者福利有效提升,不仅具有更有价值的现实意义,也是未来相关拓展研究的潜在方向。

## 七、结语

在中国经济的新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赋予了进口贸易更高价值和现实意义。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借鉴国际经验,但不能脱离自身特点,在理论和经验研究方面,进口贸易和消费者需求维度需要足够关注。本文基于“进口贸易引致消费者福利”的大量相关文献,对研究视角、逻辑思路、经验方法以及相应结论进行系统梳理和归纳分析,虽然进口贸易引致消费者福利的研究在进口产品价格、产品种类以及产品质量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在细化消费者定义、明晰理论机制、完善机制传导链条等方面还需要围绕着高质量发展目

标继续深化研究。基于此,本文对中国实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有益启示和不足之处深度挖掘,进而提出“进口贸易引致的消费者福利”方面是未来值得进一步拓展研究的方向,以期从理论和现实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

### 参考文献:

- [ 1 ] Arkolakis C, Costinot A, Rodriguez-Clare A. New trade models, same old gains? [ J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2, 102( 1 ): 94-130.
- [ 2 ] Dixit A K, Stiglitz J E.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 [ J ].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7, 67( 3 ): 297-308.
- [ 3 ] Krugman P R. Increasing returns,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 J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79, 9( 4 ): 469-479.
- [ 4 ] Krugman P R. Scale economics,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patterns of trade [ J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s, 1980, 70( 12 ): 950-959.
- [ 5 ] Krugman P R. Intra-industry specialization and the gains from trade [ J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1, 89( 5 ): 959-973.
- [ 6 ] Hausmann R, Klinger B.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patter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the product space [ EB/OL ]. ( 2006-08-06 ) [ 2020-09-10 ]. <https://www.hks.harvard.edu/centers/cid/publications/faculty-working-papers/cid-working-paper-no>.
- [ 7 ] Broda C, Weinstein D E. Globalization and the gains from variety [ J ].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6, 121( 2 ): 541-585.
- [ 8 ] Feenstra R C. Measuring the gains from trade under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 J ].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0, 43( 1 ): 1-28.
- [ 9 ] Benkovskis K, Woerz J. How does taste and quality impact on import price [ J ].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2014, 150( 4 ): 665-691.
- [ 10 ] Feenstra R C. Measuring the gains from trade under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 J ].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9( 43 ): 1-28.
- [ 11 ] Hicks J R. The valuation of the social income [ J ]. Eco-

- omic, 1940, 7(26):105-124.
- [12] Hausman J A. Exact consumer's surplus and deadweight los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1, 71(4): 662-676.
- [13] Hausman J A. Valuation of new goods under perfect and imperfect competition[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209-237.
- [14] Hausman J A. Cellular telephone, new products and the CPI[J].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Statistics, 1999:188-194.
- [15] Bernhofen D, Brown J.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gains from trade: evidence from Japa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5, 95(1): 208-225.
- [16] Huber J, Richard J. The effect on price of Japan's entry into world commerce after 1858[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1, 79(3):614-628.
- [17] 梁碧波. 源于比较优势的贸易所得:来自中国的证据[J]. 国际贸易问题, 2011(7):19-30.
- [18] 罗知, 郭熙保. 进口商品价格波动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J]. 经济研究, 2010(12):111-124.
- [19] 王孝松, 谢申祥. 国际农产品价格如何影响了中国农产品价格?[J]. 经济研究, 2012(3):141-153.
- [20] 魏浩, 赵田园. 进口商品价格对国内消费价格的传递效应研究——基于商品分类视角和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国际贸易问题, 2019, 433(1):28-40.
- [21] Belke A, Oeking A, Setzer R. Domestic demand, capacity constraints and exporting dynamic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vulnerable Euro area countries[J]. Economic Modelling, 2015, 48:315-325.
- [22] Esteves P S, Rua A. Is there a role for domestic demand pressure on export performance? [J]. Empirical Economics, 2015, 49(4):1173-1189.
- [23] Eppinger P S, Meythaler N, Sindlinger M M, et al. The great trade collapse and the Spanish export miracle: firm-level evidence from the crisis[J]. The World Economy, 2018, 41(2):457-493.
- [24] Berman N, Couttenier M. External shocks, internal shots: the geography of civil conflicts[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5, 97(4):758-776.
- [25] 戴觅, 茅锐. 外需冲击、企业出口与内销:金融危机时期的经验证据[J]. 世界经济, 2015(1):81-104.
- [26] 张龔, 孙浦阳. 需求网络结构、销售策略与出口波动:来自中国企业的证据[J]. 世界经济, 2017, 40(3):76-98.
- [27] Soderbery A. Market size, structure and access: trade with capacity constraints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14, 70:276-298.
- [28] Nicita A. The price effect of tariff liberalization: measuring the impact on household welfare[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9, 89(1):19-27.
- [29] Han J, Liu R, Marchand B U, et al. Market structure, imperfect tariff pass-through and house-hold welfare in urban China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6, 100(5):220-232.
- [30] Feenstra R C, Weinstein D E. Globalization, markups, and US welfar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7, 125(4):1040-1074.
- [31] Galle S, Rodríguez-Clare A, Yi M. Slicing the pie: quantifying the aggregate and distributional effects of trade[EB/OL]. (2017-08-28) [2020-07-30].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027841](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027841).
- [32] 孙浦阳, 张甜甜. 国际外部需求、关税传导与消费品价格[J]. 世界经济, 2019(6):47-71.
- [33] 樊纲, 王小鲁, 马光荣. 中国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J]. 经济研究, 2011(9):4-16.
- [34] Edmond C, Midrigan V, Xu D Y. Competition, markups and the gains from international trade[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5, 105(10):3183-3221.
- [35] Mudenda D. Tariffs and intra-national retail price dispersion: evidence from Zambia[EB/OL]. (2017-08-28) [2020-07-30]. [https://xueshu.baidu.com/usercenter/paper/show?paperid=0bdac51eaf0fd2d2d0b99dfc93cf28a7&site=xueshu\\_se](https://xueshu.baidu.com/usercenter/paper/show?paperid=0bdac51eaf0fd2d2d0b99dfc93cf28a7&site=xueshu_se).
- [36] 余华义, 黄燕芬. 货币政策效果区域异质性、房价溢出效应与房价对通胀的跨区影响[J]. 金融研究, 2015, 416(2):95-113.
- [37] Marchand B U. Tariff pass-through and the distributional effects of trade liberalization[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2, 99(2):265-281.
- [38] 叶德珠, 连玉君, 黄有光, 等. 消费文化、认知偏差与消费行为偏差[J]. 经济研究, 2012(2):80-92.

- [39] Atkin D, Donaldson D. Who's getting globalized; the size and implications of intra-national trade costs [EB/OL]. (2015-07-09) [2020-07-20]. <https://www.nber.org/papers/w21439>.
- [40] 肖德,杨弘,唐威. 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影响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J]. 管理世界, 2013(5):169-170.
- [41] Yakovlev E, Zhuravskaya E. The unequal enforcement of liberalization; evidence from Russia's reform of business regulation [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13, 11(4):808-838.
- [42] Feenstra R C. New evidence on the gains from trade [J].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2006, 142(4):617-641.
- [43] Ardelean A, Lugovskyy V. Domestic productivity and variety gains from trade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0, 80(2):280-291.
- [44] Romer P. New goods, old theory, and the welfare costs of trade restrictions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4, 43(1):5-38.
- [45] Feenstra R C. How costly is protectionism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2(6):159-178.
- [46] Feenstra R C. New product varieties and the measurement of international price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4, 84(1):157-177.
- [47] Petrin A. Quantifying the benefits of new products; the case of the Minivan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2, 110(4):705-729.
- [48] Mohler L. Globalization and the gains from variety [R]. Basel; University of Basel, 2009.
- [49] Cabral S, Manteu C. Gains from import variety; the case of Portugal [J]. *Economic Bulletin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 Articles*, 2010:85-102.
- [50] Giuseppe B. Variety growth, welfare gains and the fall of the iron curtain [EB/OL]. (2009-09-06) [2020-07-20]. <https://www.etsg.org/ETSG2009/papers/berlingieri.pdf>.
- [51] Minondo A, Requena F. Welfare gains from imported varieties in Spain, 1988 ~ 2006 [EB/OL]. (2010-01-03) [2020-07-20]. [https://xueshu.baidu.com/usercenter/paper/show?paperid=831df200874ac822152a5a821d410d5a&site=xueshu\\_se](https://xueshu.baidu.com/usercenter/paper/show?paperid=831df200874ac822152a5a821d410d5a&site=xueshu_se).
- [52] Chen B, Jacks D. Trade, variety and immigration [J]. *Economics Letters*, 2012, 117:243-246.
- [53] Gaulier G, Méjean I. Import prices, variety and the extensive margin of trade [EB/OL] (2006-03-02) [2020-07-20]. [https://data.bnf.fr/fr/12980242/isabelle\\_mejean/fr.pdf](https://data.bnf.fr/fr/12980242/isabelle_mejean/fr.pdf).
- [54] Mohler L, Seitz M. The gains from variety in the European Union [J].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2012, 148(3):475-500.
- [55] Feenstra R C, Weinstein D. Globalization, competition, and the U. S. price level [EB/OL]. (2009-01-15) [2020-07-20].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20019757\\_Globalization\\_Competition\\_and\\_the\\_US\\_Price\\_Level](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20019757_Globalization_Competition_and_the_US_Price_Level).
- [56] Balistreri E J, Hillberry R H, Rutherford T F. Trade and welfare; does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matter? [J]. *Economics Letters*, 2010, 109(2):85-87.
- [57] Arkolakis C, Demidova S, Klenow P J, et al. Endogenous variety and the gains from trade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8, 98(2):444-450.
- [58] Kancs A. Structural estimation of variety gains from trade integration in Asia [J]. *The Australian Economic Review*, 2010, 43:270-288.
- [59] Blonigen B A, Soderbery A. Measuring the benefits of foreign product variety with an accurate variety set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0, 82(2):168-180.
- [60] Redding J S, Weinstein E D. A unified approach to estimating demand and welfare [EB/OL]. (2016-08-05) [2020-07-20]. <https://core.ac.uk/reader/46172687>.
- [61] Melitz M J, Ottaviano G I. Market size, trade and productivity [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8, 75(1):295-316.
- [62] Devereux M B, Lee K M. Dynamic gains from international trade with imperfect competition and market power [J].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1, 5(2):239-255.
- [63] Feenstra R, Kee H L. Export variety and country productivity; estimating the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model with endogenous productivity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8, 4(2):500-518.
- [64] 钱学锋,陆丽娟,黄云湖,等. 中国的贸易条件真的持

- 续恶化了吗?——基于种类变化的再估计[J]. 管理世界,2010(7):26-37.
- [65] 陈勇兵,李伟,钱学锋. 中国进口种类增长的福利效应估算[J]. 世界经济,2011(12):76-95.
- [66] Chen B, Ma H. Import variety and welfare gain in China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2, 20(4): 807-820.
- [67] 陈松,刘海云. 中国进口种类增长贸易利得的估算[J]. 国际经贸探索,2013,29(7):16-24.
- [68] 谷克鉴,崔旭. 中国进口贸易利益规模及其分解——基于产品多样性视角的研究[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9,40(5):85-101.
- [69] 逯建,李灵杰,李长青. 进口贸易的“扩展边际”更好么?——来自17国福利效应的经验分析[J]. 产业经济评论,2017(4):75-89.
- [70] 魏浩,付天. 中国货物进口贸易的消费者福利效应测算研究——基于产品层面大型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J]. 经济学(季刊),2016,15(4):1683-1714.
- [71] 王明荣,王明喜,王飞. 产品多样化视角下中国进口贸易利益估算[J]. 统计研究,2015,32(12):46-53.
- [72] 徐小聪,符大海. 可变需求与进口种类增长的福利效应估算[J]. 世界经济,2018,41(12):25-48.
- [73] Goldberg P K, Khandelwal A K, Pavcnik N, et al.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new imported input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9, 99(2): 494-500.
- [74] Khandelwal A. The long and short (of) quality ladders [J]. Review of Economics Studies, 2010, 77(4): 1450-1476.
- [75] 施炳展. 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异质性:测度与事实[J]. 经济学(季刊),2014(1):267-288.
- [76] Hallak J C, Schott P K. Estimating cross-country differences in product quality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1, 126(1): 417-474.
- [77] Sheu G. Price, quality and variety: measuring the gains from trade in differentiated products [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Applied Economics, 2014, 6(4): 66-89.
- [78] Feenstra R, Romalis J. International prices and endogenous quality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4, 129(2): 477-527.
- [79] Melitz M J.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J]. Econometrica, 2003, 71(6): 1695-1725.
- [80] Hummels D, Klenow P J. The variety and quality of a nation's export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5, 95(3): 704-723.
- [81] 陈勇兵,赵羊,李梦珊. 纳入产品质量的中国进口贸易利得估算[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4,31(12):101-115.
- [82] 张永亮,邹宗森. 进口种类、产品质量与贸易福利:基于价格指数研究[J]. 世界经济,2018,41(1): 123-147.
- [83] Lancaster K. The economics of product variety: a survey [J]. Marketing Science, 1990, 9(3): 189-206.
- [84] Bilal M, Klenow P J. The acceleration in variety growth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 91(2): 274-280.
- [85] Imbs J, Wacziarg R. Stages of diversification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3, 93(1): 63-86.
- [86] Herzer D, Nowak-Lehmann D F. What does export diversification do for growth? An Econometric Analysis [J]. Applied Economics, 2006, 38(15): 1825-1838.